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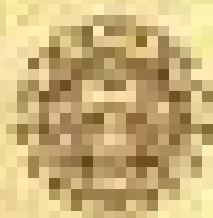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龔自珍己亥雜詩注

中華書局





東坡志林



劉逸生注

龔自珍己亥雜詩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/ (清)龔自珍撰; 劉逸生注.

—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0(2003 重印)

ISBN 7 - 101 - 01678 - 2

I . 龔… II . ①龔…②劉… III . 古典詩歌 - 作品集
—中國 - 清代 IV . I 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105744 號

龔自珍己亥雜詩注

劉逸生 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12 3/4 印張 · 259 千字

1980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
印數 19501 - 22500 冊 定價: 21.00 元

ISBN 7 - 101 - 01678 - 2/I · 278

龔自珍和他的《己亥雜詩》

十九世紀上半紀，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轉折時期。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，在這五十年間宣告它的最後結束。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，中國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。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從這上半紀的末葉開始的。

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，是中國近代史開端的第一年。自此以後的一百多年間，中國出現了許多驚天動地的變化，階級與階級的，民族與民族的，中國與外國的矛盾和鬥爭，由潛伏到激發，由局部到全面，一幕又一幕地展開。把不同階級、不同地位、不同思想、不同信仰的人全都卷了進去。這一切，是到了以後才變得明顯的。而在它的醞釀時期，也就是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之前，儘管也有些人看出諸如鴉片輸入、白銀外流、農村貧困、農民起義對清王朝的威脅這一類問題，表示了隱憂，但是，大抵都把它作為個別的局部的現象來議論。至於整個封建王朝的上層，却正如龔自珍所尖銳指出的：

秋氣不驚堂內燕，夕陽還戀路旁鴉。

——《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》

他們正象是躲在華堂深幕中的燕子，儘管外面已經充滿肅殺的「秋氣」，可是在這些「堂內燕」看來，似乎仍舊是一派溫煦的春光。他們對即將來臨的暴風驟雨一無所覺，仍舊以為「天朝」的繁華與旺是可

以永久的，即便有些小小麻煩，也不足爲慮。因而他們照樣歡歌漫舞，花天酒地，同時絲毫也不肯放鬆對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壓迫剝削。

在「世運」正在開始「潛移」之際，也曾有人能够站在思想家的高度，有力地指出清王朝眼前的處境不是什麼「盛世」，而是「衰世」，並且大膽地提出「一祖之法無不敝」，主張必須「豫師來姓」（預先汲取新興王朝的長處），不要等待別人來取而代。這在當時的確是非常大膽、言人所不敢言的議論。作出這種議論的人，是一個地主階級的進步思想家兼文學家，也是近代我國維新思想的先驅者，此人就是站在我國近代思想史的大門口的龔自珍。列寧在《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》一文中曾經指出：「剝削的存在，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『知識分子』代表中間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。」龔自珍正是這一類的代表人物。

龔自珍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杭州）人，字璣人，號定盦，又名鞏祚。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（公元一七九二年），卒於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四一年），得年五十歲。

龔自珍生長在經濟號稱繁庶，文化也較爲發達的東南地區，門第又可稱得上書香世族。祖和父輩除了任官，還有著述；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，父親麗正有史學著作，母親段馴也是詩人。龔自珍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封建文化傳統的教育，對經學、史學、古典文學、諸子百家，或深入研究，或廣泛涉獵，早年就打下相當紮實的學問基礎。其時正當乾嘉考據之學盛行，龔自珍的師友輩中，不少又是

考據學者，加上祖父輩的薰染，所以龔自珍自幼便養成考據的癖好，懂得如何「以字說經，以經說字」。他十二歲開始習誦《說文解字》，十四歲考訂古今官制，十六歲讀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開始蒐羅罕見古籍，致力於目錄學，十七歲進一步收集石刻，研究金石文字，進行古文字學的研究。凡此，都說明他自小深受乾嘉樸學的影響。假如不是「世變劇烈」，迫使他走上另一條道路，他大有可能沿着閻若璩、戴震、王念孫、段玉裁等人開闢的路子走下去，成為著名的考據學者的（清《皇朝經世文編》《經解續編》均收龔自珍的《大誓答問》；光緒重修《杭州府志·人物志》列龔自珍於「儒學」，可見當時一些人的看法）。但客觀現實的嚴峻性卻不斷地衝擊龔自珍的頭腦。他看到鴉片煙的災禍正在愈演愈烈，因鴉片入侵而引起的白銀外流、農村破產、吏治加劇腐敗、農民起義此伏彼起，以及東南沿海敵艦環伺，西北邊疆形勢岌岌……這一系列驚心怵目的事實，不能不使他深深覺得：人們竭力吹噓的「天朝盛世」，確實已經一去不返了。

他以驚人的洞察力，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。指出：「衰世者，文類治世，名類治世，聲音笑貌類治世。」而實則是「左無才相，右無才史，閭無才將，庠序無才士，隴無才民，廛無才工，衢無才商……」而且，偶然有才士與才民出，則百不才督之縛之，以至於戮之。」其結果自然是由「衰」到「亂」——「起視其世，亂亦竟不遠矣！」（均見《乙丙之際箸議第九》）

由於人才受到束縛和殺戮，於是朝廷與山野出現了相互轉化，美好的東西不再出現於「京師」而轉入「山中」。龔氏在《尊隱》一文中隱隱約約指出：「古先冊書，聖智心肝，不留京師，蒸嘗之宗之子孫，見

開娉媼，則京師賤；賤，則山中之民，有自公侯者矣。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，輕量京師，則山中之勢重矣。如是則京師如鼠壤，如鼠壤，則山中之壁壘堅矣。京師之日苦短，山中之日長矣。……龔氏甚至預見了清王朝被推翻的可能性：「夜之漫漫，鷄旦不鳴，則山中之民，有大音聲起，天地爲之鐘鼓，神人爲之波濤矣。」

龔氏又從幾個方面揭發清王朝制度的不合理。

其一曰：學與治分離。「後之爲師儒不然。重於其君，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；重於其民，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。生不荷耒鋤，長不習吏事，故書雅記，十窺三四，昭代功德，瞠目未睹，上不與君處，下不與民處。……是故道德不一，風教不同，王治不下究，民隱不上達，國有養士之資，士無報國之日。」（均見《乙丙之際箸議第六》）

其二曰：以資格抑制人才。「凡滿洲、漢人之仕宦者，大抵由其始宦之日，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，極速亦三十年，賢智者終不得越，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。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。夫自三十進身，以至於爲宰輔，爲一品大臣，……然而因閱歷而審顧，因審顧而退意，因退意而尸玩，仕久而戀其籍，年高而顧其子孫，倏然終日，不肯自請去。或有故而去矣，而英奇未盡之士，亦卒不得起而相代。……一限以資格，此士大夫之所以盡奄然而無有生氣者也。」（見《明良論三》）

其三曰：一人專斷，臣僚無權。「朝廷一二品之大臣，朝見而免冠，夕見而免冠，議處、察議之論不絕于邸抄，部臣工於綜核，吏部之議羣臣，都察院之議吏部也，靡月不有。府州縣官，左顧則爵俸至，右

顧則降級至，左右顧則革職至。……夫聚大臣羣臣而爲吏，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羣臣，雖聖如仲尼，才如管夷吾，直如史魚，忠如諸葛亮，猶不能以一日善其所爲，而況以本無性情本無學術之儕輩耶？」（見

《明良論四》）

其四曰：士大夫之無耻，其原因則爲「一人爲剛」。龔氏指出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「未嘗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，以快號令，去人之耻，以嵩高其身，一人爲剛，萬夫爲柔，以大便其有力強武。……大都積百年之力，以震蕩摧勦天下之廉耻。既殄，既殫，既夷，顧乃席虎視之餘蔭，一旦責有氣於臣，不亦暮乎！」（見《古史鈎沉論一》）

此外，龔氏還論述科舉考試制度的不合理，西域形勢之可慮，番舶入侵之頻繁，以及「自京師始，概乎四方，大抵富戶變貧戶，貧戶變餓者，四民之首，奔走下賤，各省大局，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」的危險情勢。（見《西域置行省議》）

以上幾個方面，可說都觸及清王朝政治上的痛處或社會上的隱患。因而龔自珍便發出「一祖之法無不敝，千夫之議無不靡，與其贈來者以勦改革，孰若自改革」的主張。他希望清王朝統治者「奮之！奮之！將敗則豫師來姓，又將敗則豫師來姓。」（見《乙丙之際箸議第七》）

他爲清王朝開出了一系列的「醫國之方」，如申張士氣（見《乙丙之際箸議第二十五》），保持天下之士之耻（見《古史鈎沉論一》），破格錄用人才（見《明良論三》），使臣僚有職有權（見《明良論四》），主張以「諷書射策」的辦法選用人才（見《述思古子議》）等等。此外，龔自珍又進一步指出平均財富的重要

性，他特地寫了一篇《平均篇》以申明此義。開宗明義就說：

「有天下者，莫高於平均之尚也，其遼初乎！」他指出「浮（與）不足之數相去愈遠，則亡愈速，去稍近，治亦稍速。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，直以是券矣。」他大聲疾呼，揭示不平均的災禍：

「小不相齊，漸至大不相齊；大不相齊，即至喪天下。」

平之道，龔氏認為：

「此貴乎操其本源，與隨其時而劑調之。」

——均見《平均篇》

我們可以看出，龔自珍這些筆鋒犀利，墨光四射的政治論文，深刻揭出清王朝的病癥，是言人所不敢言的。這就使不少頭腦還比較清醒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受到激勵，深感震動，不能不潛心思索國家社會的去向。清代士大夫知識分子議論時政的「一代風氣」，正是從這裏開端的。

乾嘉之際出現的公羊學派，原不過是清代經學一個分支，其初還只是純學術性，並不含有變革現實的政治內容，從孔廣森到劉逢祿都是如此。可是被稱爲「東南絕學在崑陵」的清代公羊經學，到了龔自珍手中，就從本質上發生了變化。龔自珍曾經說：

昨日相逢劉禮部，高言大句快無加。

從君燒盡蟲魚學，甘作東京賣餅家。

——《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》十四首之六

他是受到劉逢祿的一定影響的；可是龔自珍却比這些公羊經學的老前輩想得更遠也更多，立場也和他們大不相同。因為龔氏認為，重新發掘評價的公羊經學，不應該爲了復古（主要的不是爲了恢復漢儒之舊），而應該是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需要，復公羊古義的目的在於革新政治。這就不僅與蟲魚瑣屑的漢學家截然不同，便是與純學術研究的公羊經學也大異其趣。

我們可以這樣說：利用西漢今文學家提倡的「微言大義」，通過公羊經學「托古改制」的手段，使自己的變革主張獲得順利推進，換言之，將經學化爲維新變法的政治工具，這是清代公羊經學研究的一個飛躍，一種質變。它開創於龔自珍而大大發揚於康有爲等人。這是龔自珍對清代經學的一大貢獻。

不過，龔自珍在仕途上是很不得意的。由此終於阻塞了他親手施行改革政治的宏願。

龔自珍於嘉慶十五年庚午（公元一八一〇年）首次應順天鄉試，考中副榜第二十八名，那時只有十九歲。但在龔自珍自己看來，還是很不如意的。因為鄉試的副榜貢生，在一般人心目中還不是正式舉人，比秀才高不了多少。龔自珍不滿意這個「出身」，因此他在嘉慶十八年癸酉（公元一八一三年）和嘉慶二十一年丙子（公元一八一六年）兩次再應鄉試，希望取得正式舉人的資格，可惜都落了第。直到嘉慶二十三年戊寅（公元一八一八年），第四次應鄉試，即清嘉慶帝六旬萬壽恩科，他終於中式第四名舉人。那時不過是二十七歲。第四名舉人是所謂「五經魁」之一，這使龔自珍大受鼓舞，以爲科名從此一帆風順，可望置身於卿相之列，實現改革政治的理想了。

不料事與願違，龔自珍再考進士試，却連連落第。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是恩科會試，不第；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是會試正科，仍不第，只好出任一名內閣中書的微官。道光二年壬午是道光皇帝登極恩科，會試仍未第。這樣一直到道光九年，龔自珍已經三十八歲了，這年是第六次會試，才勉強中了第九十五名，殿試爲三甲第十九名，連一個翰林院也考不上，只好仍舊回到內閣中書的老位子上。

我們知道，科舉出身的高下，在那時是極關重要的。龔氏既無法「擢取巍科」，此後就始終被棄置在中書、主事的冷署閒曹之中，無從施展抱負。十年之後，終於迫得他不能不辭官而去。這就是龔自珍在官場上坎坷的一生。

龔自珍早年放言高論，詞鋒稜厲，一方面固然使他獲得許多人的注意，但同時也因此受到官僚大地主和他們豢養的「貌儒」之流的敵視和打擊。道光元年，也就是他出仕中書的第二年，他打算另找一條進身之階，應考軍機章京（清政府軍機處的屬員），就受到某權貴者的阻撓，使他落選。（龔自珍《小游仙詞十五首》的第十四首，有「吐火吞刀訣果真，雲中不見幻師身」句，就是暗述此事。）次年，某權貴又使用流言飛語的陰險手段，對龔自珍進行陷害。龔氏在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詩中，曾這樣寫道：

貴人一夕下飛語，絕似風伯驕無垠。平生進退兩顛簸，詰屈內訟知緣因。側身天地本孤絕，矧乃氣悍心肝淳，欹斜譴浪震四坐，卽此難免群公瞋。名高謗作勿自例，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。……

到了棄官回鄉之時，他回顧過去官場中的經歷，又寫道：

獬豸獬豸屬牙齒，求覆我祖十世紀。

我請於帝詛於鬼，亞駝巫陽莅鷄豕。

——《己亥雜詩》第一七一

這些都絕不是無根而發的。

政治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。站在維護已得權益的立場上的官僚大地主們，是決不會容忍龔自珍肆無忌憚地對「現存制度」加以懷疑和進行攻擊的，至於任何的變法更新，他們更是視如大敵，非加以撲滅不可。所以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當時滿朝的王公大臣，除了少數個別的之外，都是龔自珍政治上的反對者，甚至是鎮壓者。

龔自珍的確抱着「死我信道篤，生我行神空。障海使西流，揮日還於東」的改革宏願，但是，也飽受種種挫折。正如他在詩中寫的：

危哉昔幾敗，萬仞墮無垠。不知有憂患，文字樊其身。

深重的創傷，使他覺得即使是用文字來表達思想，也遭到意外的不幸：

第一欲言者，古來難明言。姑將謠言之，未言聲又吞。不求鬼神諒，矧向生人道？東雲露一鱗，西雲露一爪，與其見鱗爪，何如鱗爪無！況凡所云云，又鱗爪之餘。

——均見《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……》

當然，龔自珍并不曾屈服，也并不絕望。他有兩句詩正好道出內心的自信：

五十年中言定驗，蒼茫六合此微官。

——《己亥雜詩》第七六

對於他自己寫的《東南罷番舶議》和《西域置行省議》固然有此自信，對於其他的改革主張，他又何嘗不有此自信呢！

龔自珍也免不了時代局限和思想局限。在龔自珍生活的年代，中國還沒有脫出古老的封建主義，甚至連「西方思想」介紹到中國來的也還很少很少，所以他的思想仍被桎梏在封建主義的範疇之中（例如他的《農宗》主張，就帶有濃重的封建復古色彩）。對於清王朝，他固然敢於大膽揭露其積弊，但又常常流露出「臣子的依戀」，所謂「終是落花心緒好，平生默感玉皇恩」（見《己亥雜詩》第三）所謂「棄婦丁寧囑小姑，姑恩莫負百年劬」（見《己亥雜詩》第十六）都是這種心情的反映。這也是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嚴重弱點。至於他有時還好談佛學，追求出世，雖然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有一定關係，仍不能不是暴露了作為一個地主階級革新者的軟弱和不徹底性。

龔自珍不僅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，又是清代著名的詩人；而且「詩人龔自珍」的名氣也決不遜色於「思想家龔自珍」。一百多年來，龔自珍的詩同他的政論一樣，也產生過重大影響。晚清民初之際，學龔詩、集龔句的人之多，打開幾大冊《南社詩集》便可見一斑。南社詩人柳亞子推崇龔自珍的詩是「三

百年間第一流」，決不是過譽之詞。

可惜在龔自珍身後，著作嚴重佚失，而以詩爲尤甚。龔氏於己亥年（一八三九年）出都時，曾自稱「詩編年始嘉慶丙寅，終道光戊戌，勒成二十七卷」（見《己亥雜詩》第六五作者自注），那時還未包括《己亥雜詩》。但這二十七卷早已佚失，今除龔氏自定的《破戒草》、《破戒草之餘》外，都是後人陸續收拾的，全部合起來不過二百八十餘首。龔詩現存而最完整的，就是《己亥雜詩》了。

《己亥雜詩》是中國詩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，共有三百一十五首，都是七絕（有些是不那麼按照格律的古絕）。這一大型組詩寫於道光十九年己亥（公元一八三九年）龔氏辭官返家之時，由當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寫起，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。龔自珍於庚子年（道光二十年）春給友人吳虹生的信中，提到這事：

弟去年出都日，忽破詩戒，每作詩一首，以逆旅鷄毛筆書於帳簿紙，投一破篋中。往返九千里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，發篋數之，得紙團三百十五枚，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。

——龔自珍全集·與吳虹生書（十二）

這一組詩，是龔自珍有意識地對前半生經歷作一小總結而寫的（當然其內容不限於總結過去）。其中不少篇章是自述家世出身，仕宦經歷，師友交游，生平著述的。這種自述性質的詩，可使後人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生平爲人。但這僅僅是內容的一部分，《己亥雜詩》所涉及的遠不止此。

龔氏在寫給吳虹生信中的所謂「往返九千里」，大抵是這樣的：己亥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，

行前向一些老朋友告別，然後遵陸路南行。五月十二日抵達江蘇省清江浦，再南行至揚州，沿路會見一些友人，渡長江到鎮江，歷江陰、秀水、嘉興，於七月初九日抵達杭州。在杭州稍作停留，與舊友相見，大約八月底回到崑山縣的羽琇別墅。住到九月十五日再出發北上迎接妻兒。九月二十五日重到清江浦，十月初六日渡河北上，在山東曲阜稍作勾留，然後在河北省固安縣等候妻兒出都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與妻何韻雲及兒子昌匏、念匏女兒阿辛等南歸，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抵羽琇別墅。△己亥雜詩↓就是在這大半年時間內寫成的。

龔自珍辭官出京之初，行色匆匆，不帶妻兒，不少人以為龔自珍在政治鬥爭中是徹底失敗，從此一蹶不振了。甚至連龔氏一些朋友也是這樣想。龔自珍是怎樣表示的呢？他一出都門，就朗聲吟出四句詩：

著書何似觀心賢，不奈庖言夜湧泉。

百卷書成南渡歲，先生續集再編年。

——△己亥雜詩↓第一首

並不是停止鬥爭，宣告失敗，不過是換了一個地點罷了。今後還是照樣拿起筆桿，繼續寫我的戰鬥文章，決不歇手。

這就是開宗明義第一章，是一篇簡短而又明確的宣言書。

辭官歸去，別人以為他已成委地的落花。不妨也承認是落花吧，然而——

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

——第五首

自己還是要培育新花的。而且——

先生宦後雄談減，悄向龍泉祝一回。

——第七首

不僅培育新花而已，還要重新亮出寶劍，進行新的戰鬥。

這是《己亥雜詩》的中心主幹，值得我們充分注意。

於是我們看見年近五十的龔自珍隨處都關注着國計民生：

滿擬新桑遍冀州，重來不見綠雲稠。

——第廿一首

他記起以前曾經向直隸布政使提議在河北大量種桑養蠶，而現在顯然未蒙採納。因為農村還是一片破敗景象。

五都黍尺無人校，搶攘塵間一飽難。

——第二十首

這是城市和墟鎮一片亂哄哄的情況。因為市集上竟連一把標準的官尺都找不到了。一路上，樹木稀疏，老百姓連一間像樣的房子都蓋不起，盡是破爛的窩棚、窑洞：

龔自珍和他的《己亥雜詩》